

琬琰潮音：塔铭碑志与佛教研究*

冯国栋

内容摘要：僧尼塔铭碑志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自齐梁时代始，历代学人即对僧尼塔铭碑志进行搜集与整理。近代以来，学界利用塔铭碑志对佛教宗派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展开深入研究，形成北朝僧尼碑志研究、碑志与初期禅宗史研究、辽金元碑志塔铭研究等学术热点。在前代整理研究基础上，全面搜集、整理僧尼塔铭碑志对促进中国佛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塔铭碑志 佛教 禅宗 北朝 辽金元

饶宗颐先生曾言：“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①饶先生将碑志视为第五大新史料，说明石刻碑志对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开创金石学以来，后世学者利用石刻文献证经补史，已成重要的学术传统。

佛教石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摩崖、碑碣、墓志、塔铭、造像记、经幢、石柱、石经等不同形式。其中，记载释氏僧尼生平履历，镌刻于贞石之上的塔铭、碑碣、墓志铭，由于未经后世史家的过滤、选择、变造、修改，是研究僧尼居士生平与中国佛教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清末以来，即有中、日学者利用释氏碑志塔铭研究中国佛教。他们或以贞石证史，或以贞石补史，甚或以贞石写史，推动了中国佛教的研究。

一、释氏碑志塔铭的辑录整理

早在齐梁时代，即有释氏碑志的辑录，如梁元帝萧绎编《内典碑铭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历代释氏碑志的辑录整理与综合研究”（20&ZD266）阶段性成果。

① 饶宗颐编：《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

林》，有三十卷之多^①。而僧祐所撰《法集杂记铭》，收有《献统上碑铭》《僧柔法师碑铭》等释氏之碑志^②。降及唐代，有类书之编纂，其中也多有收释氏碑铭者。如欧阳询等人所编《艺文类聚》卷七六、七七两卷为“内典”，收有《庄严寺僧旻法师碑》《光宅寺大僧正法师碑》《国师草堂寺智者约法师碑》《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师墓志铭》《宋姬寺慧念法师墓志铭》等十余篇僧人碑志。唐代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三“僧行篇”亦收录有《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碑》《庐山香炉峰寺景法师行状》等释氏碑志。

清以后编纂各代文章总集，也多收有释氏之碑志，如清代编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现代编辑的《全宋文》《全辽金文》《全元文》等，皆有释氏碑志之搜采。对《全唐文》《全唐诗》中佛教史料进行全面辑录的有日本春日智礼《全唐文佛教关系撰述目录》与《全唐诗佛教关系撰述目录》^③。中国学者也曾对《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宗教文献进行过辑录。

历代石刻专书，如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刘喜海《金石苑》等总志，以及《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山右石刻丛编》等地方金石志书，也皆收有当地释氏之碑志塔铭。而近现代出版的石刻书籍，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西安碑林全集》《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千唐志斋藏志》《鸳鸯七志斋藏石》《曲石精庐藏唐墓志》等大型碑刻图录，皆收有释氏碑志塔铭拓本。《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续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全唐文补遗》等，也皆收有释氏碑志之录文。各地新出之石刻书籍，如《泰山石刻大全》《济南历代墓志铭》《四川历代碑刻》《山西碑碣》《三晋石刻大全》亦为各地释氏碑志之渊薮。

近现代以来，始有专门搜集宗教碑志者。约而言之，有如下几体：有专收一地者，如《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北京佛教石刻》《上海佛教碑刻资料集》《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晋城佛教金石录》《古涿州佛教刻石》。有专收一寺者，如《北京戒台寺石刻》《邢台开元寺金石志》，《禅宗大典·传记部》之《历代少林禅师碑刻》，则专收少林寺之碑刻。有专收一山

①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大正新编大藏经》第52册，河北省佛教协会，2008年，第244-245页。

②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95年，第498-499页。

③分别载《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第一期（1936年），第20-55页；《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第二期（1937年），第1-68页。

者,如《五台山碑文》《庐山历代石刻》。此类著作数量不少,然皆偏于一时一地,难见释氏碑志塔铭之全貌。同时,历代释氏碑志之目录也渐有搜集,冯国栋《唐前释氏志幽文初探》^①调查了东晋南北朝之释氏碑志,潘高凤硕士论文《唐代塔铭研究》^②则对唐代释氏之塔铭进行了全面搜集。石井修道编制的《宋代禅者塔铭·碑铭类一览表》则从文集、金石录、地方志、语录中搜集了151位禅师的塔铭、碑志^③;龚丹硕士论文《宋代高僧塔铭研究》^④,对《全宋文》中所载释氏碑志进行了辑录。

许明编《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塔铭墓志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⑤,是目前为止对历代释氏碑志收录最为广泛的著作。然而细读此书,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1. 辨伪不严:如书中收录有北魏正光五年陈景富所撰《魏故比丘尼统清莲墓志铭》(第33页),此志实为《北魏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通过改变作者与书丹者的“变脸”作伪,是一方伪志^⑥。书中所收北齐隆化元年张鹞撰《百咏南禅师塔记》(第63页),出现唐代“天宝”年号;《顺天府志》已斥其伪^⑦,而作者则据清代《上方山志》收录。又收隋开皇十二年(592)道信所写《璨大师塔铭》(第77页),而此志据樊波考证,实为唐代晚期禅宗为争夺法统而伪造^⑧。

2. 失收甚多:如本书收录北朝僧尼碑志21篇,而失收者包括《安熹僧达法度铭》《惠密为僧尼造墓志》《齐故司马氏太夫人比丘尼垣墓志之铭》《贾尼志记》等4篇。再如,书中收金代释氏碑志塔铭241篇(其中误收5篇高丽国碑志、1篇道教经幢),失收颇多,主要表现为:第一、不重视收辑最新的

①冯国栋:《唐前释氏志幽文初探》,《戒幢佛学》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

②潘高凤:《唐代塔铭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冯国栋指导),2010年。

③[日]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日本大东出版社,1987年,第555-563页。

④龚丹:《宋代高僧塔铭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沈如泉指导),2018年。

⑤下引此书,均随文标注出处页码。

⑥宫万松:《北魏墓志“变脸”案例——北魏比丘尼统清莲墓志识伪》,《中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84-86页。

⑦《顺天府志》卷十七评《上方山志》言:“文笔鄙陋无比,如载北齐《百咏禅师塔记》系伪托,至云北齐后主隆化元年重阳日沐手撰文,范阳张鹞也,北朝人无此文法。”(周家福、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82-6383页)

⑧樊波:《〈隋僧璨砖塔铭〉跋》,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十三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248-261页。

考古发现:如宁立新、雷云贵曾发现6篇僧人墓志^①,许书未收。天津蓟县独乐寺存有寺庙碑约20余通,其中塔铭5通,许书仅收录1篇。第二,对地方金石志重视不够:《孟县金石志》7篇金代墓幢、《霸县金石志》2篇金代经幢、《定襄金石考》5篇金代墓幢、《蔚州金石志》中8篇金代墓幢、《鄠县金石志》《福山金石志稿》中各有1篇塔铭,许书皆未收录。而明、清两代失收则更多,不胜枚举。

3. 出处、“版本”不善:释氏碑志塔铭有见于拓本者,有仅见录文者,有出自前代文献者,有后代文献承袭者,许书选择版本不精。如《志法师墓志铭》(第7页),此文最早见于《艺文类聚》,而作者据《宝华山志》录文。《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第16-19页)也初见于《艺文类聚》,作者却以《全陈文》录文。《定州曲阳县普照禅院满公禅师塔记》(第2091页),《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卷五九、《曲阳金石志》均有录文,各有优劣,而许书不知《曲阳金石志》亦有录文,仅据《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录文进行整理,阙失颇多。

4. 录文、点断欠精:如《济南府灵岩山第八代敕差住持传法妙空大师塔铭》(第1924-1925页),此篇1300多字,录文中缺录、误录之处有十馀处。《齐故伏波将军刘君墓志》(第58页):“伯昭玄,沙门大统上法师。令问令望,独高今古。”“上法师”即法上,曾为昭玄大统。“昭玄”为北齐之僧官,许氏将昭玄误为人名。《大隋太尉晋王慧日道场故惠云法师墓□》(第79页):“于时主上巡幸,并部大□名德敷问《仁王般若》。”“并部”即今山西,当作“于时主上巡幸并部……”。《僧运宽陀罗尼幢记》(第2129页):“大金国易州涞水县乐平村住人张从善,妻魏氏,一子正隆,二年出家,法名运宽。”许氏将“正隆”视为人名,而事实上“正隆”乃金代的年号,当作:“……一子,正隆二年出家,法名运宽。”《圆公马山主塔记》(第2069页):“崇老初自大定二十有一年夏,退大明而住岷山,俾师为山主。师亦避席下居。嘉祐至冬,有僧自北来赍亲王书疏,劝请崇老住持中都瑞云寺。”许氏将“嘉祐”视为年号,致使“至冬”不辞,实际上“嘉祐”乃寺院之名,故当作:“……师亦避席,下居嘉祐。至冬,有僧自北来赍亲王书疏,劝请崇老住持中都瑞云寺。”

二、释氏碑志塔铭研究热点

对释氏碑志塔铭的研究,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武亿《授堂金石三跋》等已启其端。利用石刻史料研究佛教史,以晚清沈曾植为巨擘。他以

^①宁立新、雷云贵:《朔州市朔城区金代僧人丛葬墓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8-145页。

《少林寺碑》证佛陀习禅少林早于达摩^①,以《中岳法如禅师行状》钩稽禅宗早期传承,以《义琬禅师墓志》补《灯录》《僧传》之阙失^②。与沈曾植相比,胡适对佛教金石文献的关注更具系统性。他曾全面搜集赵明诚《金石录》、王昶《金石萃编》以及《全唐文》中保存的佛教金石资料,并撰《佛道两教碑传目》^③。胡适利用金石以证禅史的文章尚有《〈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衢州府有白居易〈唐传法堂碑〉》《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等^④。

日本学者也非常重视金石文字对禅宗史研究的意义。宇井伯寿考证牛头法融及其世系之时,分别利用了刘禹锡《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李华《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李吉甫《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李华《故左溪大师碑》、白居易《传法堂碑》、李适之《大唐蕲州龙兴寺故法现大禅师碑铭》等碑版文字^⑤。柳田圣山在其名作《初期禅宗史书研究》中大量引用金石文字展开论述,而书后所附《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则以《唐文粹》、拓本、《文苑英华》《张燕公集》《全唐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佛祖历代通载》等七个“版本”进行校读^⑥,为金石文献的校勘录文提供了范例。

利用石刻资料研究古典禅之荦荦大者,当推澳门大学贾晋华。如她曾指出《全唐文》所载苻载《天皇道悟碑》实辑录自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已经后世禅僧窜改,不足为据;而宋代出现丘玄素《天王道悟碑》,实是吸收白马昙照生平事实而伪造^⑦。日本学者石井修道则对宋代禅宗碑刻进行了细致的搜集、研究,他从各种文集、地方志中全面搜集宋代禅师的碑铭塔志,并利用这些金石资料对宋代曹洞宗做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利用《宋故襄阳鹿门

①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卷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②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五)》,《文献》1992年第3期,第154页。

③季羨林主编,楼宇烈整理:《胡适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83-195页。胡氏辑录《全唐文》及《全隋文》中佛道两教之碑传,每一条目含碑传名、全唐文之卷数、传主卒年、作者及评论。如《神秀大通碑》后附注曰:“有法系。”《法现碑》后注:“弘忍弟子。”李商隐《四证堂碑》后注:“骈文,叙事不通。”

④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196-198、215、216-243页。

⑤[日]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第92-102页。

⑥[日]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柳田圣山集》第6卷,法藏馆,2000年,第497-516页。

⑦贾晋华:《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新探》,(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9-152页。

第二代灯禅师塔铭》梳理研究了北传曹洞宗鹿门派的变迁^①,极具启发意义。

近十多年来,利用石刻研究佛教宗派、禅宗史、佛教社会史更趋繁荣,并出现了诸多研究热点:

(一)北朝僧尼碑志的研究

北朝佛教兴盛,对政治与社会皆有重要影响,僧尼与政治关系密切,而高层妇女出家为尼更为北朝一特出现象。利用石刻,特别是造像记研究北朝佛教与政治、社会之关系,刘淑芬、侯旭东、尚永琪诸贤已启先鞭在前。近年来,对北朝僧尼碑志的研究也颇值得重视。

现所知北朝僧尼碑志 24 方中,比丘尼志有 9 方,尼统志有 2 方,如此集中的比丘尼志,为理解北朝高层妇女与佛教关系提供了史料。如北魏尼统僧芝,实为北魏后期洛阳政权实际控制者胡太后之姑母。王珊根据《僧芝墓志》考证了胡氏家族的情况、僧芝如何通过自己的影响推荐胡太后入宫,以及僧芝与孝文冯皇后、宣武高皇后等人物的关系;并对僧芝的佛学思想及北魏僧官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考论^②。石少欣、陈洪根据《慈义墓志》考察魏世宗高后出家与宫廷斗争的关系^③。蒲宣伊同样通过对《慈义墓志》的考察,认为北魏政治“子贵母死”的传统通过出家为尼这一模式得以终结;出家为尼给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女性设计了一条“生”的道路^④,是篇颇有见地的文章。另外,周玉茹^⑤、张利亚^⑥分别考察了慈庆、李尼两位比丘尼的生平与社会关系。

北朝僧尼碑志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慧光墓志的发现。慧光是北朝著名律学大师和北方地论派南道系的创立者,地位崇高。尽管《续高僧传》等史籍对其生平有详细记载,然也有许多不明之处。特别是关于慧光的生卒年,意见纷纭。2006 年赵立春首次披露了慧光的墓志(即《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并对慧光生卒年、佛陀遇慧光的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⑦。此后

①[日]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第 410—563 页。

②王珊:《北魏僧芝墓志考释》,《北大史学(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7—107 页。

③石少欣、陈洪:《北魏世宗高皇后出俗为尼考——兼谈北朝后妃出家与宫廷政争》,《文学与文化》2012 年第 2 期,第 111—116 页。

④蒲宣伊:《子贵母死的谢幕——〈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研究》,《文献》2019 年第 2 期,第 25—33 页。

⑤周玉茹:《北魏比丘尼统慈庆墓志考释》,《北方文物》2016 年第 2 期,第 91—96 页。

⑥张利亚:《磁县出土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述略》,《北朝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362—363 页。

⑦赵立春:《郾城地区新发现的慧光法师资料》,《中原文物》2006 年第 1 期,第 69—76 页。

赵阳阳^①、赵生泉^②又对墓志录文、慧光生平进行了补充。圣凯法师在《中国佛教通史》中,结合《慧光墓志》与《续高僧传·慧光传》对慧光生平思想进行更为详密的考察^③;而对于另一位地论高僧,北齐沙门大统僧贤,圣凯法师则以《僧贤墓铭》为基础,结合小南海、响堂山石窟与邺城考古的新发现,对其生平、主持寺院及思想进行了细密的考论^④。

宫万松对北朝墓志辨伪的研究^⑤,也值得重视。这对于运用石刻史料研究佛教史,无疑是重要的警醒。

(二) 碑志塔铭与初期禅宗史研究

利用释氏塔铭碑志研究禅宗史本是沈曾植、胡适开创的传统,而中外学者皆有涉足,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议题。近年来,由于新出石刻的刺激,这一领域仍不断有成果问世。

1. 《神会塔铭》的研究:温玉成首先刊布了洛阳出土的神会塔铭,并据此塔铭定神会生卒年为684年至758年,享年七十五岁^⑥,从而纠正了《宋高僧传》所记668年至760年,九十三岁之说,以及胡适所考670年至762年,九十三岁之说。张乃翥、叶万松考订塔铭中的“嗣虢王”即安史之乱中节度河南的唐宗室李巨,说明神会与香火钱的具体细节^⑦。此后,还有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诸位工作人员^⑧、李学勤^⑨、叶万松、商志譚^⑩、杨泓^⑪等的文章阐幽发隐。

①赵阳阳:《〈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录文校补》,《文教资料》2006年第36期,第58-59页。

②赵生泉:《东魏〈慧光墓志〉考》,《文物春秋》2009年第5期,第41-47页。

③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4-302页。

④圣凯:《僧贤与地论学派——以〈大齐故沙门大统僧贤墓铭〉等考古资料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4期,第63-74页。

⑤宫万松:《北魏墓志“变脸”案例——北魏比丘尼统清莲墓志识伪》,《中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84-86页。

⑥温玉成:《记新出土的菏泽大师神会塔铭》,《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第78-79页。

⑦张乃翥、叶万松:《禅宗七祖菏泽大师神会塔铭引论》,《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第61-67页。

⑧余扶危、邢建洛、尚巧云、高虎:《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文物》1992年第3期,第64-67、75页。

⑨李学勤:《禅宗早期文物的重要发现》,《文物》1992年第3期,第73-75页。

⑩叶万松、商志譚:《洛阳龙门出土神会塔铭考辨》,《文物》1994年第11期,第81-83、32页。

⑪杨泓:《七祖墓塔披露禅宗秘书》,香港《文汇报》1992年7月8日。

2.《侯莫陈寿塔铭》的研究:《侯莫陈寿塔铭》的研究吸引了更多的学者,美国学者伯兰特·佛尔(Bernard Faure)于1986年发表《智达禅师与北宗之“顿悟”》^①,从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中发现崔宽所撰侯莫陈琰之寿塔铭,并指出敦煌出土的数种文献皆出自侯莫陈琰之手,而其所倡的“顿悟”思想早于神会。其后,伊吹敦于1992年再次对此塔铭做研究,发表了《〈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与荷泽神会》^②,田中良昭发表《〈神会塔铭〉与〈侯莫陈寿塔铭〉的出现及其意义》^③,证明历来作为神会独创的“顿悟”“南宗”“传衣”等思想实由神秀系禅师首先提出。龙成松利用新出土的北朝隋唐侯莫陈氏家族墓志,揭示侯莫陈家族与佛教的关系^④,从而为理解侯莫陈琰及《顿悟真宗要诀》提供更多的背景。

3.《僧璨塔铭》的研究:与早期禅宗史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僧璨塔铭》的研究。对于《僧璨塔铭》,民国时期端方、徐乃昌即有记载。1985年,陈浩披露了1982年浙江杭州出土的僧璨塔铭砖^⑤。樊波则对杭州等地出土的僧璨塔铭进行深入研究,通过与唐代其他禅宗碑志的比较,认为《僧璨塔铭》或为唐代晚期的伪作,并非塔铭自题的“隋开皇十二年作”的隋代遗物^⑥,是一篇功力深厚的考证文章。

4.神会弟子塔铭的研究:神会一系虽然盛于一时,然中唐以后,传承不明,释氏碑志为研究神会一系提供了重要线索。首先是神会弟子慧坚之碑文。张岩对出土于1945年的《慧坚碑》进行录文,考察了碑石出土、入藏碑林的情况,并对慧坚生平做了简单考证^⑦。此后再云华对慧坚之生平做进一步考证^⑧。杨曾文结合《神会塔铭》对慧坚与“嗣虢王”李巨的关系,以及慧

①Bernard Faure, “Le Maître de Dhyāna Chih-ta 智達 et le ‘subitisme’ de l’Ecole du nord,”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2. 1986, pp123-132.

②[日]伊吹敦:《〈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と荷沢神会》,《日本・中国仏教思想とその展開》,山喜房佛書林,1992年,第293-325页。

③[日]田中良昭:《〈神会塔铭〉と〈侯莫陈寿塔铭〉の出現とその意義》,《禅文化研究所紀要》第24卷,1998年,第221-236页。

④龙成松:《北朝隋唐侯莫陈氏家族与佛教研究——兼论〈顿悟真宗要诀〉之背景》,《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第69-78页。

⑤陈浩:《隋禅宗三祖僧璨塔铭砖》,《文物》1985年第4期,第8页。

⑥樊波:《〈隋僧璨塔铭〉跋》,《碑林集刊》第十三辑,第248-261页。

⑦张岩:《慧坚禅师碑考述》,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四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06-111页。

⑧冉云华:《〈唐故招提寺慧坚禅师碑〉考》,《中华佛学学报》1994年总第7期,第97-120页。

坚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①;又撰文对神会与慧坚之关系有进一步的探讨^②;还利用五台山佛光寺出土《无名和尚塔铭》,结合《宋高僧传·无名传》等资料,对神会另一弟子无名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揭示了华严澄观曾参无名和尚,并咨决南宗禅法的事实^③。

5. 北宗弟子塔铭的研究:依照传统禅史的记载,北宗在普寂、义福之后,已趋消亡,而石刻史料则呈现,直至禅宗第十一世仍有北宗弟子的活动,补充纠正传统灯史的记载。张伯龄对藏于碑林的北宗神秀弟子义福的《大智禅师碑》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义福的生平、撰书者、碑阴题名以及碑首碑侧的雕刻艺术^④;然对义福的生平着墨不多。徐文明利用《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故左溪大师碑》《唐故东京安国寺契微和尚塔铭》对北宗第八代弘正的影响与贡献做出探讨^⑤。季爱民以2002年出土于嵩岳寺的《先藏禅师塔铭》为基础,考证北宗第十一代传人先藏的生平,并借此观察中唐时期北宗禅在洛阳地区的传播情况^⑥。

(三)辽金元碑志塔铭的研究

如果说北朝僧尼碑志的研究多从政治、社会视角入手,隋唐僧尼碑志的研究多与宗派的考察相连;而辽金元释氏碑志的研究,则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视角与方法:

1. 对僧尼碑志塔铭的刊布与考证:例如李逸友通过对呼和浩特及周边元代佛教石刻的调查与研究,考察了丰州四座僧塔,认为元代丰州地区仍然有非常强劲的禅宗势力^⑦,又对万部华严经塔中的石刻进行录文与介绍^⑧。

邹宝库、张博泉对辽阳佛教石刻的刊布:邹宝库分别撰文介绍了1981年发现于辽阳的《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并对志主金世宗之母贞懿皇后的生平

①杨曾文:《关于〈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的补充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37-43页。

②杨曾文:《〈神会塔铭〉和〈慧坚碑铭〉的注释》,《佛学研究》1998年总第7期,第27-37页。

③杨曾文:《〈唐同德寺无名和尚塔铭并序〉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佛学研究》2000年总第9期,第208-213页。

④张伯龄:《〈唐大智禅师碑〉考释》,《碑林集刊》第四辑,第93-103页。

⑤徐文明:《禅宗第八代北宗弘正大师》,《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第32-39页。

⑥季爱民:《唐元和三年〈先藏禅师塔铭〉考释》,《文物》2020年第2期,第59-65页。

⑦李逸友:《元丰州僧塔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第1期,第102-106页。

⑧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文物》1977年第5期,第55-62页。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考古》1979年第4期,第365-374页。

进行考证)和发现于辽阳的金明昌元年《东京胜严寺禅师塔铭》^①。张博泉对邹宝库的文章进行了补充^②。

对北京地区辽金元释氏碑志的考察与研究有:宣立品利用《大金燕京宛平县金城山白瀑院正公法师灵塔记》(圆正)、《白瀑寿峰禅院第九代衍公长老塔铭》(源衍)、《金城山白瀑寿峰禅寺第十一代勤公禅师塔铭》(本勤)等石刻,考证金元时期白瀑寺禅师的法派传衍^③。包世轩利用庆寿寺明代碑刻对金元大庆寿寺住持僧侣进行考证^④。马垒介绍了收藏于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潭柘寺等地的塔铭、墓幢^⑤。

对河北地区相关碑刻的刊布:杜平对正定县文保所藏《从公塔铭》进行研究^⑥,刘友恒介绍元代《十方东天宁寺圆公之塔》《真定府东天宁禅寺英悟大师和公监寺之塔》《敕赐十方天宁禅寺第二代传法住持月公长老寿塔》等三方塔铭^⑦。

对山西佛教碑志的调查:如解光启对交城县王山两通金代禅宗碑刻予以介绍与录文^⑧。

对豫北佛教石刻的调查与刊布:如温玉成先后探讨过《法如碑》《神会塔铭》《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元好问《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元代《宣授扶宗宏教大师释源宗主江淮诸路都总摄鸿胪卿赠司空护法大师龙川和尚舍利塔志》等碑志的佛教史价值^⑨;也对白云寺《大宋卫州共城县白鹿山白茅寺五百罗汉碑》等碑刻进行了介绍与录文^⑩。

①邹宝库:《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考古》1984年第2期,第175-177页。邹宝库:《辽宁发现金代塔铭刻石》,《文物》1995年第12期,第74-75页。

②张博泉:《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补证》,《考古》1987年第1期,第89-90页。

③宣立品:《白瀑寺禅师史迹考——以金元时期为范围》,《北京文博文丛》2017年第3期,第38-50页。

④包世轩:《金元大庆寿寺高僧寻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94-99页。

⑤马垒:《门头沟区现存元代石刻综述》,《北京文博文丛》2018年第2期,第42-52页。

⑥杜平:《元天宁万寿禅寺住持从公舍利塔铭》,《文物春秋》2011年第6期,第70-71页。

⑦刘友恒:《正定天宁寺元代塔铭考略》,《文物春秋》2018年第4期,第73-78页。

⑧解光启:《金〈太原交城县王山修建十方圆明院记〉与〈第二代体公禅师塔铭并序〉碑》,《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2期,第26-35页。

⑨温玉成:《读碑杂录——碑刻资料对佛教史的几点重要补正》,《法音》1984年第3期,第38-42页。温玉成:《元好问〈徽公塔铭〉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第41-42、64页。

⑩温玉成:《辉县白云寺踏察记》,《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第99-101页。

2. 释氏碑志与宗派研究:对于辽金元佛教宗派的研究,以往多重视华严与密宗,而从石刻史料来看,禅宗的曹洞、临济、云门在10-14世纪的北方地区也极为兴盛,其中以曹洞宗最为强劲。日本学者石井修道对金代曹洞宗进行了较为深细的研究,特别是对早期人物青州希弁的研究已相当深入^①。近年来,杨曾文、邢东风、李辉、刘晓利用释氏碑志对北方禅宗的研究推进甚多。关于临济宗大师海云印简,杨曾文对《海云禅师碑》进行了考证^②;邢东风对海云碑、海云像、海云塔,以及山西大同、河北正定等地与海云相关的碑刻与遗迹进行了立体深入的考察^③,启人良多。李辉近年来致力于辽金元佛教石刻与宗派史研究,先后发文对金朝曹洞宗、临济宗的起源、传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④。刘晓以《万松舍利塔铭》为基础,对金元之际曹洞宗与万松行秀之生平进行再考察^⑤。赵振华对《龙川和尚舍利塔》《宗密圆融大师塔铭》进行考察^⑥。

3. 释氏碑志与政治社会史研究:王锦萍利用山西所存石刻,对僧道团体在水利社会中的作用进行探讨^⑦。王菲菲通过对杭州地区寺院记与塔铭的考察,认为元代僧士关系与宋代相比发生了变化:僧人对士人而言地位更为独立,士人对佛教的态度则更为积极^⑧。沈伏琼利用山西交城玄中寺碑刻史料,对玄中寺住持传承与下院问题作考证,认为玄中寺丛林的发展与蒙元朝廷息息相关^⑨。

①[日]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第286-288页。

②杨曾文:《佛教与中国历史文化》,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336-355页。

③邢东风:《海云印简遗迹及相关历史文化之考察》,《中国佛学》2013年总第33期,第18-39页。

④李辉、冯国栋:《曹洞宗史上阙失的一环——以金朝石刻史料为中心的探讨》,《佛学研究》2008年总第17期,第284-295页。李辉:《金朝临济宗源流考》,《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第22-29页。

⑤刘晓:《万松行秀新考——以〈万松舍利塔铭〉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3-130页。

⑥赵振华:《元朝白马寺释源宗主塔铭考》,《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3期,第66-75页。

⑦王锦萍:《宗教组织与水利系统:蒙元时期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僧道团体探析》,《历史人类学学刊》2011年第1期,第25-49页。

⑧王菲菲:《元代江南地区僧侣与世俗文士关系的演化与历史转型——以杭州寺院记文与僧人塔铭的书写为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第92-102页。

⑨沈伏琼:《蒙元时代山西玄中寺史事考辨——兼论玄中寺与蒙元朝廷之关系》,《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8-125页。

三、简短的结论

对于历代释氏碑志塔铭的研究,虽然清代学人已启其端,近十馀年,学界利用释氏碑志在北朝佛教与政治、初期禅宗史、辽金元佛教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总体而言,研究的深度、广度上仍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端:

1. **研究时段不平衡**:由于各时段史料的多寡与石刻文献的丰富性不同,研究在时段上的不平衡也明显存在。对于北朝、隋唐、辽金元的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也较为丰富,而对于南朝、两宋,特别是明、清佛教石刻的研究明显不足。明、清两代的佛教石刻由于没有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基本家底不清;同时,明、清两代佛教研究整体上相对薄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佛教石刻的搜集与深入研究。

2. **研究方法单一**:金石学最初的目的是“证经补史”,因此研究者多仅将石刻作为史料加以应用,而对于石刻本身的发展、石刻史料的复杂性研究不够。石刻具有文物性、文本性、历史性、社会性等特征,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石刻的文本性,对其他性质重视不够。因此,如何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艺术史、文化史、文体学、历史学、宗教学知识与方法,对释氏碑志进行整体研究,仍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3. **对释氏碑志塔铭利用的整体性不够**:研究成果通常仅局限于对一篇或几篇石刻材料进行“挖宝式”的研究,对于各代释氏碑志的整体利用不够。由于缺乏全局性的把握,常常导致结论的片面性。唐前由于佛教石刻相对较少,对每篇文献进行深入研究是可能的;但对于明、清释氏碑志,由于数量庞大,故必须借助现代手段,充分运用统计等方法,呈现释氏碑志的总体特点。

总而言之,经过前人的调查、搜集、整理,释氏碑志塔铭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然则,如前所述,释氏碑志塔铭在搜集、整理方面仍存在体例不善、辨伪不严、搜集不全、整理不规范等问题;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时段不平衡、方法单一、整体性不够等问题。因此,在全面调查搜集、规范整理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学、地理学、年代学、宗教学、文化史、艺术史等多种方法对释氏塔铭碑志进行综合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作者简介】冯国栋,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佛教文献学、佛教与中国文学。